

濮

与

中华民族

金钟一著



广州新华出版发行集团
广州出版社

013935946

K28
30

漢與中華民族

金 钟 著



北航

C1643414

广州新华出版发行集团

 广州出版社

K28
30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濮与中华民族/金钟著. —广州: 广州出版社, 2012. 6

ISBN 978 - 7 - 5462 - 0291 - 4

I. ①濮… II. ①金… III. ①中华民族—民族历史—研究

IV. ①K28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0) 135319 号

书 名 濮与中华民族

Pu Yu Zhonghua Minzu

出版发行 广州出版社

(地址: 广州市天润路 87 号 9、10 楼 邮政编码: 510635

[http: //www. gzcbs. com. cn](http://www.gzcbs.com.cn))

责任编辑 杨 斌 彭向明 陈召珍 黄 婧

责任校对 陈洁仪 欧瑞平

装帧设计 谢成华

印 刷 广州市快美印务有限公司

(地址: 广州市越秀区横枝岗路 64 号大院自编 9 号 1—4 层

邮政编码: 510095)

开 本 889 毫米 × 1194 毫米 32 开

印 张 20

字 数 688 千字

版 次 2012 年 6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2 年 6 月第 1 次

书 号 ISBN 978 - 7 - 5462 - 0291 - 4

定 价 59.00 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 影响阅读, 请与承印厂联系调换。



序

当你第一眼看《濮与中华民族》这本书时，我想你一定会被这个新颖奇特的题目深深吸引。“濮”是什么？是人名，地名，还是民族名？这个名称与中华民族到底有何关系？为什么能够与“中华民族”这个无比崇高、无比庄严的名词相提并论？这个问题相信即便是历史专业的学生，甚至是一些学者，对它也多少有点疑惑不解。因为在数千年来积集的浩瀚史籍里，从中国“正史”祖师爷司马迁写的《史记》到近、现代的《中国通史》、《史稿》、《史纲》之类的史籍，以及许许多多的断代史，除了现代民族史学家何光岳在《南蛮源流史》里有一专章对“濮”略有论及之外，在所有被认为是“正统”的中国史籍里，是从来没有人把“濮”当做曾经在神州大地上，为创造灿烂辉煌的中华古代文明作出了伟大贡献的古代民族而认真地着墨论文交代，以确立它在“史”里应有的地位。

翻开目录，看到里面有一行写着“夏是濮人建立的王朝”时，也许有人会情不自禁地脱口而出：“不可能！”接着便不自觉地加入“千夫指”行列，说：“这是睁眼说瞎话，堂堂的中国夏、商、周文明，岂有可能是名不见经传、落后的什么‘濮（百）越’先民所能建立的？！”于是，对历史怀有极度偏见的人，可能就不屑一顾地把书扔到一边了。可是，相信多数求知欲强，治学态度严谨，对历史情有独钟或爱好探索的人，则可能觉得新奇而去探个究竟，力求了解在古老的中华大地上，究竟是谁为它的古代文明作出如此巨大的贡献，神州大地的上古时期，谁又是叱咤风云的主人。

其实，细心的读史者和善于探究者并不难发现，在浩瀚的史籍里和中华大地上，由北至南，从东到西，众多的专有名词（如人名、地名、民族名等）都有同（近）音异写的濮、蒲、薄、浦、埔、铺、博、仆、卜、普、布、步、扒、百、伯、陌、白、泊、破、播和伏、浮、孚、符、富、夫（古无轻唇音，故此六音不读 fu，而读 pu），以及庖、苞、褒、阜等字。这些不同的汉字，都是古濮（百）越语 pu 或地方变音 po、pou、pau 的同音、近音异译（写）字。pu 是专用于

“人”前面的必带量词“位”（因濮越语里，讲“人”，一般都必须说 pu vun，而不单说 vun）。在夏、商时，甲骨文 pu（位）就已译（写）
 位 人
 作“衍”，后改作“濮”而广泛流行。pu（位）不是名词，但译（写）作“濮”用来专称某古代民族之后，历史便以讹传讹了几千年。在现今山西、陕西、河北、河南、山东这几个原夏代版图的“省”境内，尽管历史流逝了数千年，朝代更替了十几个，但是，由于古濮越先民生息过而被命名的一些古地名，仍然因这块闪亮的金色土地而熠熠生辉，使我们能够十分清楚地看到他们曾经走过的足迹，并听见他们曾经叱咤风云的呼啸声。下面列举数例，足以证明（史籍中存留数量众多的古濮越语，其中各种专有名词及地名的汉字译音将用国际音标标明濮越语的相应音值。详见书中各章节）。

山西：蒲州（今永济）；蒲县；播明（pu^mbe:ŋ “邻居”）；伯强
 位 边
 （pu kaŋ “后来者”）；陌南（pu na:m “奴隶”、仆人、佣人）；扒
 位 后面
 楼、破鲁（是 pu lau “我们”的同音异译）。

陕西：蒲城、褒城与蒲州、蒲县一样，是“濮（pu）人”的城池；蒲溪（pu k'ai “耕田人”，今侗语仍读此音）；富（pu）县；富
 位
 （pu）水；博望（pu ma:ŋ “村里（乡下）人”）；普（pu）集（“濮
 村寨
 人的集市”）；白豹（pu pau 本是 pu lau “我们”，因声母同化变为 pu
 pau，汉字译作“白豹”）。

河北：蒲阳（pu ja:ŋ “种粟人”，今顺平县）；博野 [pu jai “耕
 位 粟
 田人”，与今“布依”族是同（近）音异译]；步古（pu kau “我
 我、我们
 们”）；泊头（pu tau “我们”，今布央语仍读此音）。

河南：濮阳与蒲阳是同音异译；浚陂、陌陂（是 pu pi “兄长、
 大哥”的同音异译）；博望与陕西博望同；伏牛、白牛 [pu ya:u “我
 位
 们”的同音异译，今壮语（北）仍读此音]；白秋（pu tsau “我
 我们
 们”）。

山东：临濮（lam pu “同是濮人”）；蒲汪（pu va:ŋ “水口、
 用 水口；河口



河口”); 博兴 (pu hun “濮人”); 淄博 (是 pu tsai “耕田人” 的倒装); 铺上 (pu so:ŋ “种稻人”); 发城 (pu 城 “濮人” 城池; “发” 不读 fa, 而读 pu, 汉字可写作“拨”); 泊头, 与河北的“泊头”同; 泊里 (pu li “山地人”); 泊子 (pu tsai “耕田人”);

此外, 与河北毗邻的辽宁、吉林、黑龙江和内蒙古自治区东边的一部分地区, 是古称“夫余” (pu ji “耕田人”, 与今布依族的“布依”是同音异译) 的地方。公元 10 世纪建立的辽国 (907—1125) 以及近代所称“辽宁”省的“辽”, 都是由濮越语 lau “我们” 的汉字译音约定俗成的。

可见, 上述地名虽然只是濮越先民在生息过的地方命名的千万个原始地名中遗存下来的极少一部分, 但是, 它却足以证明这些地方, 确确实实是濮越先民曾经生活过的历史舞台。

据《史记》载, 夏代王朝经历了 470 多年, 至桀为商汤所灭。汤原为夏代诸侯, 祖先也是濮越人。这并非凭空臆测, 而是有根有据, 可以充分证明的。

(一) 司马迁根据史料及传说所写的《殷本纪》, 开宗明义说: “殷契, 母曰简狄, 有娥氏之女。”这句话里, “契, 简狄, 有娥”三个词都是濮越语的汉字译音词。“契”, k'ai, “犁、耕”, 今侗语仍读此音。濮越语在“人”名前边一定要有一个必带量词 pu “位”, 即 pu k'ai, “耕田者, 种田人”; “简狄” kun di, “好人”; “有娥”, jau jo:ŋ, “我们 (是) 种粟人。”全句意思是: “殷 (代) (一位) 种田人, 母亲是好人, (她是) 我们种粟人的姑娘”。

(二) “汤始居亳, 从先王居” (《史记·殷本纪》司马迁)。“亳”在今河南商丘北。“亳”是“濮”的同音异译 (写) 字。河南、河北、山西、陕西、山东是濮越先民长期生息并建立夏王朝的地方。汤的祖先世代生息在“亳”, 所以“汤居亳”是“从先王 (祖先) 居”。

(三) 汤的摄政总理大臣——伊尹是濮越人。所谓“伊尹”其实是濮越语 jivun “耕田人” 的汉字译音。他的名字叫什么, 当然已无

人考证，也无从可考。因为当时汉文字仍处在初期发展阶段，远未能普及应用，所以，商王朝的活动史未能完全用文字记录下来以流传后世。司马迁（西汉）写《史记》，是汉字经过了1000多年的发展，进入了普遍应用的成熟阶段，《史记》是根据春秋战国时代成书的《左传》，及一些零星的文字资料和口头历史传说，再加上司马迁对历史发展的天才的理解和认知编撰而成的。

“伊尹”是历史传说人物。“伊、夷、越”濮越语同音，“伊尹”即“夷人”或“越人”。但自从始译者将濮越语 *ji vun* 用汉字译音写作“伊尹”，并被司马迁记载在《史记》以后，2000多年来，就一直被当作真人名广泛流传，即便是最权威的著名史学家，也无法考证，便没有人敢于挑战司马迁，怀疑它是否是真人名字了。现在我们否定《史记》关于“伊尹”的真实性，相信必定会遭到“千夫指”。不过，信也好，不信也罢，商汤的摄政大臣“伊尹”是濮越人，这是事实。至于他的真名叫张三、李四或王五已无关紧要。春秋战国时代，根据当时的历史传说，将濮越语 *ji vun* 用汉字译音写作“伊尹”的始译者，给我们留下这个十分珍贵的历史语言素材，使我们能够追寻古濮越先民的历史足迹，从而清楚地知道古濮越人在历史中的活动及其定位，不能不说是功德无量！

当然，《史记》和其他典籍里存留的古濮越语很多，《殷本纪》也并不只上述几个。如：

昆吾 是 *kun wu* “咱人”的汉字译音。“诸侯昆吾为乱。汤乃兴师……伐昆吾。”这里的所谓“诸侯”，即部落或部族。濮越语 *kun wu* “咱人”被始译者写作“昆吾”用来指称某古濮越人部落或部族后，就被史籍当做部落及其成员名称而流传了数千年。今云南傣（西）称“人”仍读 *kun*。

有夏 是 *jau jo* “我们本领高强”的汉字译音。“夏”王朝之所以称为“夏”，是当时某部分势力最强大的濮越先民，兼并了许多弱小部落方国之后建立起来的。他们因“本领高强”（*jo* 或 *ja*）而被称作“夏”。《夏本纪》里，“国号曰夏后”这句话的“夏后”同样也是濮越语 *jo hau* “我本领高强”的汉字译音。今海南临高话，“我”仍读 *hau*，用汉字可译写作“后”或“侯”。2000多年来，有



些古史学家因不懂濮越语而望文生义乱加解释，将“后”理解为“王后”再引申为“君（王）”，误导后人。

卷陶 是 *kun tau* “我们（的）人”的汉字译音。“汤归至于泰_{人 我们}卷陶，中垒作诰”，“卷陶”始译后已被作地名。今河北南部与河南濮阳地区相毗邻的地方，已写作“馆陶”。布（濮）央语称“我们”仍读 *tau*。

后稷 是 *hau tsit (tsik)* “糯米”的汉字译音。“后_{米 饭 糯}稷降播，农殖百谷”*hau* 读不同声调有不同意义：高降调是“藤”，中平调是“我”，低平调是“米饭”，高平调是“进”，低平调是“瓢”等，计八九个。因糯米俗称为“百谷之王”，用途广，做成的食物贮存时间最久。如熬成汤拌石灰作建筑原料比水泥还硬，可千年不腐，故历来为人们赞叹不已。自古以来，民间有许多有关糯米的美丽传说，尤其说它是仙女从天宫里用口含着偷来的种子，下凡教情人种植的动人故事，更为流传久远。也许正是由于这种种传说的不断变化，最后，糯米就变成教民播种百谷的“后稷”，甚至在《周本纪》里，竟然成了“首王”。

閼夭 是 *hog jau* “我们”的汉字译音。“西伯之臣閼夭之徒”。
(前缀) 我们
hog jau 被写作“閼夭”之后，用作人名。

姜里 是 *kau (kou) li* “我山地人”的汉字译音。用作地名，
我 山地
在汤阴之南。

恶来 是 *wu loi* “咱山里人”的汉字译音。“纣又用_{咱 山}恶来善毁谗，诸侯以此益疏”。始译后用作人名。

比干 是 *pi kun* “长兄”的汉字译音。“西伯滋大，纣由此稍失权重。王子比_{兄 人}干谏，弗听。比干曰：‘为人臣者，不得不以死争。’纣怒……剖比干，现其心。”

祖伊 是 *tsu ji* “耕田人”的汉字译音。*tsu*、*tu* “隻”本是动物名词前的专用量词，但泛指“人”时，也常用，无尊意。史籍中常见用汉字译音写作“朱、杜、土”等。“西伯伐饥国，灭之，纣之臣祖伊闻之而咎周。”

禄父 是 pu luk “儿子”的倒装。“父”非“父亲”，不读 fu，而

位 儿子

读 pu。“封纣子武庚禄父，以续殷祀”。

牧野、目夷 是 ^mpu ji (jai) “耕田人”的同音异译字。古濮越语

位 犁

^mpu “位”历史音变分化为 mu 和 pu，意义不变，都是“位”。今佤佬语仍读 mu，用汉字可写作“牧、目”等。壮语、布依语读 pu。今河北的地名“博野”与“牧野”是同音异译。“牧野”在河南淇县西南。

鹿台 是 lok do:i “山麓”的汉字译音。“甲子日，纣兵败。纣走

麓 山

入，登鹿台，衣其宝玉衣，赴火而死”。

这些还不是全部，但它们却足以证明，夏、商时代是濮越先民在中国历史舞台最活跃、影响最大最深远的时代。商汤的祖先虽然也都是濮越先民，但汤灭夏建立了商王朝之后，统治者对不甘愿夏亡而敢于反抗、不服统治的濮越先民，不管它是部落、部族或独占一方的诸侯小国，一样顺我则昌，逆我者亡，镇压讨伐，决不手软。从此，濮越先民“蛋打鸡飞”，加上没有文字系统的记载，活动事迹只能靠口头传说流传。数百年以后，到了周朝，文字才逐渐普及流行，但所记录的只是周朝中叶以后的事。这样，曾经为建立夏王朝作出了卓越贡献的濮越先民，只能被默默无闻地淹没在中国历史长河中，成为不为人知的一片历史沉积，任由历史的激流在上面奔逝流淌几千年。

然而，兽过留迹，鸟过留声。曾经在世上出现、生存过的事物，是不会永远被彻底埋没的。当星辰变幻，沧海桑田时，沉积里的“金沙”就会在阳光下显露它的本色，闪出耀眼的光芒而被人们发现、拾掇，还其庐山真面目。

濮越先民既然曾经在广袤的神州大地上叱咤风云数千年，曾经缔造过中国历史上的第一个王朝，春秋战国时代，又名正言顺地建立了越国。濮越民族从内外兴安岭，渤海之滨，到西南境外，长江、珠江、怒江、金沙江、澜沧江，纵横数千公里，都布满了他们的足迹。因此，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濮越民族是神州大地上，历史最悠久，分布地域最广阔，人口数量最多，延续活动的时间最长，对中华古代文明和现代文明贡献最大的民族。这样的民族，尽管在史籍里没有被真



实地记载（史籍所记录的只是由濮越民族最强势的一支，建立夏、商、周王朝后，发展成为汉主体民族的历史），但是，人口如此众多的族群，只要他们不是从地球上彻底消灭，而只是被历史发展的巨臂扭曲而改变了面貌继续向前发展，那么，它在历史长河中的深层影响是不会被完全彻底埋没得连一丝踪影都没有的。

事实也是如此。几千年来，用汉字记录的浩瀚史籍中，从甲骨文到明清各种史籍的字里行间，都存留着许许多多用汉字译音的古濮越语词（当然也不排除有其他民族语词）。它们由于被披上了汉字的“外壳”，所以，一般人都认为是汉字。但是，如果认真考究，仅从汉字的意义上去理解，却往往解释不通。于是，多数人只能囫囵吞枣，跨过这些文字的“拦路虎”，但求一知半解足矣，因为再欲深求也不可能。如果哪位历史学家或古文注释家自认为聪明过人而“望文生义”，胡乱解释，那么，他若不是掉入历史迷雾的深渊而不能自拔，便会是成为人们茶余饭后的笑柄。例如，被公认为历史上最著名的晋代注释家郭璞，注解扬雄《方言》中的“虎”（《方言·卷八》）这个字时，说：“虎，陈魏宋楚之间或谓之李父，江淮南楚之间谓之李耳。”郭璞因不知道“李父”、“李耳”都是土家族语，为“公虎”与“母虎”的汉字译音，便从汉字“望文生义”注曰：“虎食物值耳即止，以触其讳故”。

土家语称“公”为 bu³¹ 或 pu³¹，称“母”为 ɲi³⁵ 或 ɲie³⁵。“公虎”为 li³¹pu³¹，扬雄用汉字译音写作“李父”（古无轻唇音 f，故“父”不读 fu，而读 pu），“母虎”为 li³¹ɲi³¹，用汉字写作“李耳”。在没有音素标音的情况下，这是比较贴切的。郭璞不知道“江淮南楚之间”为何称“虎”为“李耳”。便强不知以为知，望文猜义，把虎看作像人一样知道忌讳的动物，捕食动物，吃到耳朵即止，故成为千古笑谈。当然，几千年来，对这些汉字译音词望文猜义，乱加解释的人并不止郭璞一个，细心的读者只要认真探究，会发现仍不乏其人，尤其在古代民族史研究领域里更是常见。

这种情况之所以产生，充分说明了古濮越民族对中国历史的影响深远。由于它的发展艰难曲折，史前活动无文字记载，最强势的一支建立夏、商、周王朝之后，便以全新的面貌发展演变成成为更先进更强大的汉民族，其余部分则跟随历史发展进程，自然发展。因此，从周

朝以后用文字记录下来的中国历史，便再也没有可能去追记古濮越先民的活动史。因而在《中国通史》和一些“断代史”的字里行间，从来就没有将它载入而见诸史籍。

但是，由于它是人口众多的大民族，语言使用的社会基础深厚，在神州大地上生息活动过的地域广袤辽阔，用古濮越语命名的山川河海港湾，村镇城池，到处皆是，因而这些名字不可避免地在有意无意之中被收入史籍，流传后代，为我们打开濮越先民活动的历史舞台大门提供了十分珍贵的钥匙。

濮越先民是开创中华古代文明的先驱，他们为建造瑰丽辉煌、璀璨夺目的中华历史殿堂立下了不朽的功勋，为博大精深、绚丽多姿，对人类进步影响巨大的中华历史文化奠定了坚实的基础。那么，它的存在，它的历史，是不容抹杀的。它不但应该被公认，而且应该在中国历史上大书特书，让全世界都知道，让炎黄子孙都了解和敬仰。这不仅丝毫不损害今日汉民族的尊严，相反，会给汉民族带来更大的光荣和骄傲。因为今日的汉民族并非自天而降，而是在濮越先民经过了数千年发展进步的基础上，至汉代以后才逐渐发展形成的。良渚文化、河姆渡文化、仰韶文化、龙山文化、红山文化等，都是濮越先民前仆后继，用他们一代又一代辛劳的汗水创造出来的历史夜明珠。他们是中华民族引以为荣的无价历史瑰宝。

我写《濮与中华民族》的目的主要是想通过发掘存留在史籍里众多的古濮越语历史“金沙”，拂去历史封尘，让其显示庐山真面目，从而进一步探讨古濮越先民在神州大地上生息活动的历史概貌，唤起人们热爱祖国，热爱中华历史，追寻祖先的足迹，继承他们百折不挠、勇往直前的精神财富，为人类的未来作出更多更大的贡献！

也许有人会发问：仅凭史籍存留数量有限的历史语言资料，就能知道濮越先民的历史？未免把复杂的历史问题看得太简单了吧？

当然，如果说谁把这些历史语言资料当做照相机，以为通过它就能轻而易举地把数千甚至上万年前古濮越先民生息活动的真实面貌，看得一清二楚，那是绝不可能的，谁也没有这么大的本事。但是，如果说，把它当作窥视历史的小管，则有可能。因为滴水可观太阳，小管可窥全豹。虽然豹的绒毛、胡子看不清楚，但豹的斑纹、轮廓概貌则大致八九不离十，人们知道它是豹而不是虎或其他动物。



语言是社会的镜子。人类社会一切群体活动所创造或发现的事物，通过人脑思维抽象概括凝成语词，再经过“约定俗成”变为社会人人共识，人人共同使用的社会财富。群体社会生产、生活的一切，被概括抽象凝成千万个语词，反映了全社会群体活动的方方面面，社会历史发展的每一个脚印都可以从语言里显示得十分清楚。

语言又是历史的“活化石”。语言凝聚了历史进程的每一步，历史发展进程中的所有发现和创造，都被如实记录并反映在语言中，无论是最古老、最久远，抑或是最新近出现的事物都概莫能外。这是由于语言不是断代的产物，它是人类社会不可以须臾或缺的相互交际、交流思想的工具。社会不可以一分一秒没有语言，否则社会就不可能存在。正因为如此，所以，最古老的基本词汇和与时俱进的最新语词，亲密无间，和睦共处于同一种语言词汇库中，任由人们随时调遣。基本词汇是任何一种语言中最古老、最稳固的词汇，如天、地、人、山、水、石、太阳、月亮、星星等，都是数千上万年不变或少变的。而新词新术语由于它是紧跟社会发展的步伐，每日每时产生并迅速“入伍”，及时反映社会的进步和历史发展，因此，它是语言中最活跃、发展最快的语词。但当历史变更，例如朝代更替，某些反映旧朝代的词语，就会被淘汰而逐渐从交际领域里消亡。

人们使用语言进行交际、交流思想，只要需要，是不分古词或新词的，它们共存于同一语言篇章中。如果是“书面语”，则有可能载入史籍流传久远，让后代人清楚知道先人们的事。例如，史籍记载的所谓“乌桓”、“鲜卑”族人，现代中华大地上已经没有这些古代民族存在。但是，《后汉书·乌桓鲜卑列传》记载：“乌桓者，本东胡也。”“鲜卑者，亦东胡之支也，别依鲜卑山，故因号焉。其言语习俗与乌桓同。……汉初，亦为冒顿所破，远窜辽东塞外，与乌桓相接”。

我们从史籍记载的这些片言只语中，知道“乌桓”与“鲜卑”都是“东胡”人。而所谓“东胡”，即是“东边的胡人”。“东胡”与“东夷”是不同时代、不同人对生息在神州大地东边古濮越先民的不同译称。濮越语称“咱、咱们”读作 wu，被始译者用汉字译音写作“胡”或“吴”；对外自称（我们）是“种（耕）田人”读作 pu ji 位犁 (jai)，始译者将 ji 用汉字译音写作“夷”。所以，“胡”也好，“夷”
耕

也罢，它们所指的都是濮越先民。既然如此，我们可知，2000 多年前史籍记载的所谓“乌桓”和“鲜卑”，实际上他们也都是古濮越先民。“乌桓”和“鲜卑”这两个古语词，像久埋地下的化石一样，经过鉴定，让我们清楚知道，他们都是汉代以前或汉初，在辽东塞外的古濮越先民的其中一部分。这样，我们对长期生息在神州大地东边的濮越先民的历史，虽无法得知全貌，但至少也能略知一二。可以推断并肯定，山东、河北一带，春秋战国至秦汉，仍有数量不少的濮越先民在那里生息，汉初及以前，因战乱，有一部分被迫逃到了辽东塞外。这部分人，从此不再被称之为“濮”，而是被称为“胡”载入史册。

我是古濮越先民的后裔，生长在当今壮族山乡，讲地道的壮语，20 世纪 50 年代初，更是有幸师从老一辈语言学家马学良教授等，专门研读现代语言学，掌握语言演变理论，洞悉语言演变规律，学会追溯语言演变的历史，分析现代语言的现状，这为我从事教学与研究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从中学开始，我便发现在各种史籍里，都有许多看起来是汉字的字，但从汉字意义去解释却理解不通，相反，如果拿壮语去对照，则音义皆明。例如，不同的史籍里，有所谓的“牂柯僚”、“苍梧烧”、“僮（撞）牯佬”等不同的称谓，皆指称中世纪居住在粤、桂、湘、黔、滇的濮（百）越先民。为什么他们有的被称为“牂柯僚”，而有的又被叫作“苍梧烧”或“僮牯佬”呢？这些称谓到底是什么意思，它们从何而来？如果只从汉字意义去寻求答案，我敢说，所有汉族的历史学家，即使是最著名、最权威的历史学家，也说不出所以然。因为不懂古濮越语，根本无法知道，史籍上记载的这些所谓“牂柯僚”、“苍梧烧”和“僮牯佬”，实际上都只不过是不同时代、不同地域、不同文化层次的人，根据他们本身对汉字的认知、熟悉程度，对古濮越语 $so:\eta$ (tso: η) klau (ku¹ lau 或 ku¹ jau, 括弧内的注音是地域历史变音——笔者) 即“我们种稻人”用汉字译音的不同译写。壮族人至今仍自称 pu $so:\eta$ (tso: η) “种稻人”，或者 pu ji (jai) “耕田者”。

这是由于壮族先民古濮越（“耕田者”的汉字译音）人最早发现野生稻谷可以充饥，并将它们扩大种植造福人类之后，成为他们在交际中最纯朴、最坦诚、最原始、最基本的自称，至今，千百年不变。



数千年前史籍里记载并一直流传至今，误导数亿人，并令历代史学家头痛莫解的所谓“蛮”、“夷”，也都是古濮越语的汉字译音词。

“蛮”是古濮越语^mba:n “村庄、村寨”的译音。^mba:n，地域历史语音分化为 ma:n 和 ba:n。^mba:n 与 ma:n 始译者用汉字译音写作“蛮”，在没有音素作记音手段的时代，其准确、贴切程度是无可非议的。当今古濮越先民后裔的壮族、布依（pu ji 史籍译写作濮越或濮夷）族、云南西双版纳的傣族、贵州的水族、广西毛南族等，称“村庄、村寨”都仍读作 ba:n、²ba:n 或 ban（用汉字译音通常写作“板”、“版”或“阪”）；云南德宏地区傣族、广西罗城仫佬族读作 ma:n（用汉字译音可写作“蛮”）。

“夷”是古濮越语 ji “犁、耕”的译音。经数千年地域历史语音发展的演变，“犁、耕”的读音，已不单纯地读 ji，而是有的读 ji，有的读 jai 或 joi、jui，有的读 tsi 或 tsai、çai。声母的演变，已非一般人所能理解。例如，傣语读 t'ai，侗语读 k'ai，水语、毛南语读 kwai，仫佬语读 k'vai，黎语读 lai，谟语读 loi。

远在数千年前，始译者把古濮越语本是 pu ^{位 村}ba:n “村里人（乡下人）”和 pu ^{位 犁、耕}ji “种田人”各自的第二个音节，截译为“蛮”和“夷”，用来指称古濮越先民，不仅使之谬误讹传了几千年，而且由于只译音不释义，致使数亿后来人因望文猜义而在潜意识里认为近代仍生息在神州大地上众多的少数民族都是一些“未开化的野蛮人”，而从心底里自觉不自觉地产生莫名的歧视。直至 1950 年以后，由于新的民族平等政策的深入实施，这种情况才得到了彻底改变，少数民族不仅政治地位平等，可以参与管理国家事务，而且经济、文化生活也得到了极大的改善，迈上了真正是各民族共同繁荣并进的新的历史康庄大道，共同为祖国的繁荣富强努力奋斗。

但是，由于种种历史原因，也由于历代多数史学家不懂濮越语，少数懂得的也没有注意去深入挖掘、探讨研究，致使这些存留于史籍的古濮越语词，数千年来，一直无奈地被“幽禁”尘封，默默地被淹没在历史长河的底层。

经多年的再三酝酿思考，我认为以我们今天的能力和智慧，如果不把史籍存留的古濮越语词挖掘出来，并以它们为主线，向世人勾画

出一幅古濮越民历史足迹概貌图，让中华民族的后代清楚地知道，数千年前古濮越先民早已为人类、为中华古代文明作出了非同凡响的巨大贡献，那么，我们就将继续成为碌碌无庸之辈而对不起先人，对不起历史！

当然，人类的活动史从来都是一部非常复杂纷繁的延续史，再高明的历史学家，也都只能略古详今，谁也不愿也不会傻到倾毕生精力去“明知不可为而为之”地“详古”。我们当然更不可能具体详知古濮越先民究竟怎样生产、生活，怎样集群体智慧为中华古代文明作出非凡的贡献。但至少通过我们的努力，披荆斩棘，辟出一条新路子，让后人踏着我国艰难奋进的足迹，继续探索开拓前进，相信总有一天，濮越先民历史的庐山真面目，一定会清清楚楚地在博大精深、璀璨辉煌的中华历史殿堂上熠熠生辉，流传千古！同时，中国历史上的第一个王朝——夏朝，总有一天，历史学家们也会异口同声地承认，其创建者，绝对是神州大地上历史最悠久、人口最多、分布地域最广阔、对中国史前古代文明贡献最大最杰出的濮越先民。

夏朝距今约 4000 年，由于当时文字尚未发展到普遍用来记事的阶段，所以，夏朝近 500 年的历史，除了一些零星不成系统的口头历史传说，几乎是一片空白。司马迁《史记》里的所谓《夏本纪》，是 1000 多年以后，根据当时的民间口头传说和前人根据口头传说记录下来的零星文字资料，天才地编撰而成的。其中的所谓“帝系传替”的“世系表”并不真实。这 17 代君王的名字在完全没有文字记载的情况下，单凭口头历史传说，经过 1000 多年，竟然还能够准确无误地保全了下来，岂不是世界的头号奇迹吗？稍有点常识的人，谁会相信呢？！

但是，天才的司马迁，却以他天大的本事，不知从哪里弄来 17 个古濮越语的汉字译音词，串编成这个所谓夏代《帝王世系表》，令人信以为真，将数亿人骗了 2000 多年，至今有些人仍深信不疑。

当然，否定《史记·夏本纪》的《帝王世系表》，并不等于否定夏朝的存在。相反，正是由于这个《帝王世系表》揭示出来的是百分之百的古濮越语的汉字译音词，正好铁证了夏朝是由濮越先民势力最强大的一支建立起来的王朝。虽然《帝王世系表》的人名不真实，但并不能否定夏朝的存在，更不能否定夏朝近 500 年的统治存在真实名



字的帝王统治者。历史知识告诉我们，整个夏朝，肯定不只 17 个帝王，而且每个帝王都一定会有自己的名字，只是因为当时还没有成熟通用的文字而无法真实地记录流传下来而已。司马迁在夏亡之后所写的《史记·夏本纪》里编撰的《帝王世系表》，只能根据当时在北方仍有强大势力的濮越先民后裔生息的地区还广泛流传的历史传说，不完整地记录并拼凑而成的。

既然夏朝《帝王世系表》不真实，又无从考证，无法弥补，是历史造成的结果，我们当然不能违背历史去伪造、填补历史。历史造成的空白，只能让那些空白保留其原来的真面目，直至永远。因为在人类发展过程中，没有文字记载的史前期，总会留下许许多多无法知道而令人遗憾的历史空白，即使有了文字记载，真实的史实也还会因妨碍统治者利益而被歪曲、隐瞒或删改，造成局部的历史空白。因此，从历史的高度看，夏朝《帝王世系表》里，帝王名字是否真实，无关重要，重要的是创建夏朝，推动中国历史前进的民族及具体创造历史的每一位名叫张三或李四的帝王，是的的确确真实存在的，他们的的确确为夏朝，为中华历史的发展立下了伟大的历史功勋。对于这样的人民群众，历史是不能抹杀，也是抹杀不了的。历史工作者，有责任也有义务，追寻他们走过的足迹，尽可能将点点滴滴记入史册，使其流传后世。树有根，水有源，后世的人们，不能不知道自己的祖宗。我们研究夏朝的历史，追寻建立夏朝的古代民族，就是为了追寻中华民族古代祖先的足迹及身影，了解祖先们的历史贡献及开创历史坚韧不拔的精神。

最后还要说的一点是，学历史的，一定也要学点语言学，历史系应该开设语言学科。因为人类发展到今天，科学发展到今天，语言贡献最大。人类因有语言而别于一切动物，人类活动的每时每刻、每分每秒都离不开语言。人类推动历史前进的每一步，生息繁衍的每一块地方、每一个时段，语言都会开花结果，洒落并牢牢地根植在人们活动的土地上，被镌刻在闪光的史册里，成为无比珍贵的历史及历史的铁证。即使是千万年后，人们仍可以根据这些“语言化石”去追寻祖先走过的足迹，追寻历史。因此，研究历史，尤其是像中国这样有数千年文字连续记载的历史，已不可能以从（历史）书本辗转传抄的学究方式去研究，而是需要从多学科、多方位地去深入考察印证，才能

得出符合史实的正确结论。

由于数千年来记录中国历史的各种典籍浩如烟海，而在这烟波浩淼的文字海洋中，历史沉积的宝物数不胜数，如果不懂一点语言学，就缺少了一些追踪历史并透视历史的手段，就很难从根本上正确、清楚地回答讲不同民族语言（如现代的粤语、闽语、吴语和普通话）的社会群体的历史来由及其发展的历史进程的方向。当然，也很难从根本上正确清楚地回答像汉族为什么称之为“汉”，它是怎样发展而来的等一些未解的千古之谜。

人类的历史与语言，自古以来就是紧密相连的。没有语言就没有社会群体的存在，也就没有人类社会的发展史。没有人类社会的存在，当然也就谈不上有什么语言。社会发展过程中出现的每一件事物，和客观世界上存在的千万种事物，都是通过人脑抽象概括凝成不同的语词，然后在人群交际过程中，准确无误地反映自然、反映社会的现实和发展。所以，1949年以前，中央研究院（中国科学院前身）设立的“历史语言研究所”，将历史与语言放在一起是不无道理的。本书的出版面世，如果能因此而引起史学界对语言学的重视，从而让更多的学子自觉修习语言学，那么，可以肯定，在不久的将来，中国史学研究的春天必将来临，史学园地里百花争艳的欣欣向荣景象定会呈现。那时，中国史册记录的，将不仅仅是已往历代帝王将相的活动史，更多展现的将是各民族劳苦大众，千百年来，如何共同奋斗，创造伟大中华古代文明和现代文明的光荣历史。

我们坚信，这样的历史时代一定会到来！

金 钟

二〇〇七年三月一日于澳大利亚悉尼莱因科夫金钟书斋